

意識形態？ 就業困境？過河拆橋？ ——1968年末知青大潮興起重探

• 秦 暉

摘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動因，長期以來有意識形態與就業困境二說，均有部分道理，但就1968年末知青上山下鄉的「大潮」發動而言，本文認為毛澤東掀起大潮的主要動機並非解決就業，雖然也不反對說毛澤東抱持理想主義，但是從他看重「會寧經驗」中王秀蘭這類典型，卻不理會紅衛兵聞人的主動下鄉來看，意識形態與解決就業恐怕都不能說是當時的第一動機；對紅衛兵卸磨殺驢應是他當時首先考慮的出發點；至於「縮小三大差別」就更是無從談起。這次大潮與文化大革命的轉折——從主要整官僚轉向主要整民眾，尤其是造反派——密切相關，治知青史者不可只注意「縱向背景」，而忽視「橫向背景」。

關鍵詞：知青運動 文化大革命 大李莊鄉 會寧經驗 再教育

現代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一般認為在1950年代出現「初瀾」，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大潮」，改革之初的1980年前後落幕。它直接折騰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後續影響更是至今可見，也因此成為現代中國史的一大熱點。

近十多年來，知青史研究出現一大爭論：毛澤東發動這樣一場運動，究竟是為甚麼？當初運動中強調的自然是意識形態宣傳，但改革之初當局決定結束這一運動時，則認為運動是由於經濟凋敝導致的就業困境，使「上山下鄉」成為城市畢業學生的主要出路。言下之意是：現在經濟脫困了，就不需要上山下鄉了。對於要在「不爭論」意識形態的條件下另覓新路的改革而言，這樣的解釋合情合理，也曾為嚴肅的研究者所廣泛接受。早在知青運動尚未結束的1977年，美國學者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的《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一書就認為：中國政府讓知青

下鄉的根本原因，是為了解決當時城市面臨的就業壓力^①。改革時期中國大陸知青史研究的代表作——定宜莊、劉小萌的兩卷本《中國知青史》（《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主要也是持這一觀點^②。但2004年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在其力作《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中則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毛澤東發動這一運動主要出於意識形態動機，為的是按馬列主義觀點讓知識份子與勞動者相結合以「培養可靠的革命接班人」^③。他還認為中國的上山下鄉受到蘇聯的影響，因為蘇聯的「大墾荒」運動中也曾把城市青年派往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做開墾工作^④。

潘鳴嘯的研究其實就是證明毛澤東自己說的動機。改革時期中國官方的「不爭論」迴避了這一動機，潘鳴嘯重新提出，當然不是要肯定毛澤東，而恰恰是要批判這一動機，指出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要為「失落的一代」悲劇負責。但在價值判斷之前，事實判斷自然更為基礎。毛澤東真的只是因為（或主要因為）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就把一代城市青年趕到鄉村？

當然，人們做事往往有多重動機，事實上伯恩斯坦和劉小萌都不會否認毛澤東有烏托邦思想，正如潘鳴嘯也不會否認文革中的中國存在就業困境。他們爭論的只是何者為主要動機？同時，長達一代人的知青運動也經歷了複雜的演變，不同時段的主要動機不會是一樣的。雖然一般認為知青下鄉自1950年代已有初瀾，但劉小萌和潘鳴嘯的書名分別有「1966-1980年」和「1968-1980」字樣，顯然他們（以及今天的多數關注者）的焦點都不在於為甚麼中國會有知青下鄉，而在於文革中知青下鄉為甚麼會突成大潮。而這個大潮恰在文革高潮的1968年末發生，離開文革就不可能理解這一大潮的成因。筆者認為迄今知青史研究的缺陷在於對知青下鄉現象、中國經濟史，以及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前後（縱向）演變梳理雖多，但對1968年文革運動的巨大轉折關注不夠。知青大潮畢竟是文革史的一部分，治知青史者不可只注意「縱向背景」，而忽視「橫向背景」。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和中國的就業困難都並非此時才有，但何以唯獨此時會掀起大潮？這是探討知青運動主要動機時不能忽視的，本文即為重探此問題而作。

一 大李莊鄉與會寧縣：兩段「最高指示」的由來

1955年7月，毛澤東正在運籌「三大改造」中最重要的一環，即以全面加速合作化為中心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他在案頭看到了一本《互助合作》小冊子——這是由當時的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到北京參加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時帶去的經驗材料。時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廖魯言看到其中一篇文章〈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後，將其呈送給毛澤東閱覽。文中所謂「一個鄉」就是河南郟縣的大李莊鄉，此文寫的其實是1954年的事，那年辦合作社時缺少會計和記工員，鄉裏便動員在校讀書的農村青年回來：「全鄉在貧農和下中農

裏面，有7個沒升學的中學生和25個高小畢業生，把兩個中學生分配到老社，其餘的全部分配到7個『社架子』去，以便解決會計和記工員不夠的困難。」毛澤東對此產生了興趣，即興揮毫寫下了這段按語：「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⑤

這段話在後來大規模知青運動時期被奉為兩大「最高指示」之一，並被濃縮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八個字。它最初所指的大李莊鄉，在文革中隆重更名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文革後知青宣傳降溫，人民公社也被廢除，那裏於是又恢復了「大李莊鄉」的舊稱。後來為了開發旅遊，當地覺得當年的榮光可用，又改名「廣闊天地鄉」（簡稱「廣天鄉」）^⑥。

到了1968年歲末，毛澤東在考慮文革中紅衛兵造反運動的善後問題。這時又有一篇報導吸引了他的注意：當年12月10日《甘肅日報》頭版刊出宏文〈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講述「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⑦。有論者指出，「上山下鄉工作開展以來，毛澤東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看到此文後大為讚賞，「立刻讓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派記者到甘肅會寧縣實地核實稿件真實性，然後轉發全國」^⑧。12月22日《人民日報》轉發經記者修飾增補的《甘肅日報》宏文，毛澤東親自把標題中的「城裏」加一字改為「城市裏」，並指示在這篇文章前加上「編者按」，發表了那段著名的「最新最高指示」（又稱「12.22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⑨自此知青運動有了領袖親自發出的「動員令」，於是全國響應，舉國動員，上山下鄉從此前城裏學生的選項之一，發展成為規模空前的「一片紅」（全部畢業生都下鄉）大潮。

幾十年來，上述分別發表於1955和1968年的兩段「最高指示」一直被當做知青運動的靈魂，家喻戶曉，舉世聞名。人們還常把兩段話中各自最點睛的四個字放在一起：「大有作為，很有必要」，以強調知青上山下鄉與貧下中農相結合、改造世界觀、在農村幹革命的偉大意義。

二 從「大有作為」到「很有必要」：兩個完全相反的案例

現在我們回顧這兩大「最高指示」由來的兩個事件：1955年的大李莊鄉案例和1968年的會寧縣案例，卻發現兩者存在極大的差異，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認為這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案例。

在大李莊鄉，回鄉「大有作為」者是一些讀過書的年輕人——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在當時文盲遍地的鄉村可以說就是「知識青年」，但他們並不是城裏人，甚至也不同于後來所說的作為農民子弟的「回鄉知青」，因為他們同時也是「貧下中農」，即上述「全鄉在貧農和下中農裏面，有7個沒升學的中學生

和25個高小畢業生」。這其實是典型鄉村常態：「舊社會」裏窮人讀書雖然不易，但並非全無可能。1954年的中學畢業生應該已經在「萬惡的舊社會」裏讀過小學了。河南郊縣並非老解放區，而毛澤東寫按語的1955年離新區土地改革結束才三年多，至於這一回鄉故事實際發生的1954年，則離土改過去僅兩年。那時的年輕人多是在土改前的「階級」狀態下成長的。而土改後出生的貧下中農子女到1968年也許已經「忘了本」，需要接受階級的「再教育」了，但在1954年，他們之中最年長的還只是幼兒，連上學受教育的年齡都沒到，更何談畢業後接受「再教育」？

換言之，大李莊鄉案例的主角就是三十二名讀過些書的青年農民，「本人成份」（不是「家庭出身」）就是貧下中農。其實1968年後在城市的職業中也一樣，那時讀過些書的青年工人也就是工人階級，沒有人認為他們就是所謂「知青」，還需要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但是讀過些書的人去務農則不一樣，他們就算務農到老，似乎也還是「老知青」，表現再好也就是「先進知青」，沒有人認為他們就是貧下中農。不過，在1955年還不是這樣，那時青年農民如果土改時定了貧農或下中農成份^⑩，即使讀過些書也還是貧下中農。《互助合作》這本小冊子並沒有稱他們為「知識青年」。毛澤東的按語雖然把他們稱為「知識份子」，但這與他們同時也是貧下中農並不矛盾。這段按語也沒有提到接受「再教育」、與工農相結合、改造世界觀、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城鄉、腦體）之類的意識形態話題。

因此，這些人回鄉並不是接受「再教育」。恰恰相反，按照近年來當事人的回憶，當初讓他們回鄉的初衷「就是讓窮人後代掌權」。原來，當時合作社裏並不是真的缺會計和記工員，只是那兩人「成份」不好，所以就讓貧下中農的「自己人」替換了他們^⑪。而且，在這些人回鄉的1954年，農村還處於「過渡時期」，農民本身正在經歷從個體小農到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改造」，1954年甚至還是「改造」的初期。毛澤東這時的名言是「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⑫，而不是要別人接受農民的「再教育」。當時中國人口中城市人口只佔百分之十幾，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剛啟動，工業建設正在蘇聯援助下大規模開展，市民就業並不困難。那時「統購統銷」剛起步^⑬，全方位的糧食定量配給和由此導致的城裏人和農村戶口間的戶籍壁壘也尚未形成，至少尚未固化，城鄉關係相對正常。那時的農民，尤其是讀過些書的農民被招工進城的機會還不少。

所以，近年來學界出現的關於發動知青運動兩大動機（迫於就業困難的經濟動機、改造知青成為「共產主義新人」的意識形態動機）究竟哪個為主的爭論，並不適用於大李莊鄉的案例，因為這兩大動機在1955年都並不突出。大李莊鄉那三十二名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回鄉，既不是因為就業無門，也不是因為這些貧下中農還要接受「再教育」，而是為了新辦合作社的記工員與會計需求。《互助合作》小冊子對大李莊鄉案例的介紹以及毛澤東的按語，基本上還是就事論事的。如果說有甚麼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那也就是為了推進合作化而已。

而1968年會寧縣的情況就迥然不同。首先，會寧縣那篇文章的核心其實非常明顯，就是為了解決城裏人（「城鎮居民」）就業無門的困境，這從〈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的醒目標題就可以看出。這些人留在城裏只能「吃閒飯」，成為「國家負擔」，所以要動員他們下鄉——這就是該文的核心邏輯。正如文章作者後來概括的，這篇文章講的是：「使職工家屬走革命化的道路，走大慶家屬之路，減輕國家負擔，決定動員全區職工家屬和閒散人員到當地農村參加勞動生產（也有種說法是幹部下放勞動），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區〔會寧縣所屬的定西地區〕各縣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動員安置。」^⑭所以，如果說大李莊鄉案例與「安置就業」還是「意識形態改造」之爭無關的話，那麼會寧縣案例就是一個典型的安置就業的例證。

但有趣的是，1968年會寧縣的「安置就業」卻並不是針對所謂的「知識青年」，而是針對城鎮居民。在這方面，會寧縣與大李莊鄉兩個案例的故事主角身份完全不同，甚至在許多方面可以說是截然相反：如前所述，當年大李莊鄉回鄉的是讀過些書的農民，而會寧縣下鄉的卻是未必讀過書的、包括文盲在內的城鎮居民。大李莊鄉回鄉的三十二人都是青年，而會寧縣下鄉的城鎮居民則有老有小，其中最突出的典型就是據說講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這句名言的王秀蘭，竟是個不識字的老太太。

據《會寧縣志（1990-2005）》載：「時年54歲並身有殘疾的王秀蘭率全家於1968年7月到河畔公社落戶，成為轟動全國的有名人物。……1979年2月王秀蘭全家返回縣城仍為居民，同年6月病故。」^⑮而更詳細的地方資料說^⑯：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多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甚麼一定要住在城市裏吃閒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

近年當地人寫的另一篇資料，價值觀已有所不同，但事實描述還是基本一致且更詳細^⑰：

1968年，會寧縣城的城鎮居民下鄉落戶運動，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影響幾乎遍及全國各地。而帶頭下鄉落戶的城鎮居民王秀蘭，成了當時國人皆知的風雲人物。

據記載，1915年出生的王秀蘭，家居會寧縣城，是一個純樸老實的家庭婦女，文盲。1965年，她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

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革委會千方百計地動員城鎮居民下鄉到農村去。其主要做法有四種：一是「颶颶風」與「清理階級隊伍」攪在一起，將一些列為批鬥對象的居民強制到農村落戶。二是採取硬逼硬趕的辦法，對部分思想不通或有實際困難的居民，採取註銷戶口，停止糧油供應，停職停學，強行拆房等行為，逼迫其離城。三是通過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從思想上「動員」城鎮居民到農村去。四是樹「典型」。由此，縣革委會的人想到了王秀蘭。屈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壓力，王秀蘭違心地報名下鄉，來到會寧白草塬四百戶村落戶。同時和王秀蘭一起報名的還有王慶一等4戶居民。其中，王慶一是普通工人，他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何必在城裏『拉死狗』」。「拉死狗」是會寧縣城人常說的話，意思是「無所事事」。

1968年6月26日，會寧縣城關鎮革委會將7名「颶颶風」的批鬥對象及家屬第一批強制下放到農村，隨後動員城鎮居民下鄉掀起高潮。縣革委會為此還成立了會寧縣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號召全縣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向王秀蘭等5戶居民學習，「到農村去，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截止當年12月上旬，全縣已有178戶932人分別下放到13個農村公社去參加農業集體生產勞動。

撇開王秀蘭的豪言壯語是否「違心」不論，這裏講的事實與主流資料一致：當時會寧縣動員下鄉的對象是城鎮居民。該縣為此樹立的五個典型，第一個就是王秀蘭。其他幾位包括上文提到的普通工人王慶一，因工廠在文革中停產而賦閒（失業），還有高中畢業的知青王永強和只有十四歲的女青年羅蘭芳（文章未提及羅的學歷，按其年齡應只是高小學生或初中生），最後是高玉蘭，「她雖然下鄉才幾個月時間，但由於各方面表現好，已被社員們評為標兵」^⑧，但如今可查的所有報導都沒有提到她的學歷，也沒有說她是「知識青年」（如王永強那樣）。而按當時的形勢，即便《甘肅日報》初次報導時有所忽略，但《人民日報》發表修改版時已經定調宣傳知青下鄉並且要求增補材料，如果她是知青就絕不可能忽略這一身份。因此，在無法查閱原始檔案的情況下，筆者只能估計她也是一般家庭婦女。

顯然，五個典型中只有一個是知青，而最出名的一號典型——文盲、老大娘王秀蘭則「知識」（指學歷）與「青年」都無從談起。所以，當時甘肅定西的這場運動根本就不是知青運動，而只是一場強制壓縮城鎮人口的運動。1968年文革中誕生的甘肅省、定西地區、會寧縣三級「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都是軍人掌權的「軍政府」，運動雷厲風行。據一位知青的回憶文章，定西地區「行動比較快」的靖遠縣已經有50%的城市（應為城鎮）居民下鄉，會寧縣次之，40%的城裏人被送往農村，「下去的人雖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較扎實」^⑨。

當時這麼做的動機其實就是為了壓縮「吃閒飯」者，「減輕國家負擔」；不但根本沒有提到學生的思想改造、與工農相結合等，也完全沒有「縮小城鄉差別」之意——據當事人回憶，當時掌權的定西軍分區司令員孫繼力在向記者介紹情況時就「性格直爽」地說：「定西是個窮地方，城市和農村差別不大，城裏

住的，大部分也是農民，下與不下區別不大。」^②其實可以說，這裏的「城鄉差別」，恰恰是在城裏的「下等人」都被趕走、只剩下「革命需要」的「高端人口」後，才空前凸顯的。

三 兩個典型都不符合「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總之，1954年的大李莊鄉與1968年的會寧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李莊鄉回鄉的是貧下中農，而不是他們的子女，當然更不是城裏學生；而會寧縣下鄉的全是城裏人。大李莊鄉回鄉者並不是出於就業壓力，而會寧縣城裏聚集着大量「吃閒飯」者，就業壓力似乎非常嚴重。然而時隔十三年的這兩個典型，卻也有兩個一致的地方：第一，它們都不是一場城裏學生上山下鄉的運動；第二，它們都不符合「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與工農相結合」的意識形態主題。

大李莊鄉故事的主角不是城裏人，會寧縣故事的主角不是學生，他們都與毛澤東為會寧縣那篇文章發出的「12.22指示」所說的「城裏幹部和其他人……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不是一回事。而且，大李莊鄉的主角雖然讀過些書，在當時也可以說是知青或知識份子，但他們同時也是貧下中農，如何談得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會寧縣的老太太王秀蘭不僅不是知青，自己在「舊社會」也是「苦大仇深」的貧寒人家，她還用得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且不說她並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又何來「再教育」？另一個典型王慶一本身就是個普通工人，工廠垮了，工人被「精簡」下鄉在當時也算普遍，但工人階級接受農民的「再教育」，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便頗成疑問。

無怪乎這兩個案例雖然在後來的知青運動中膾炙人口，毛澤東時隔十多年為這兩件事分別發出的兩段「最高指示」更是被奉若神明，但是兩個案例中的當事人後來都沒有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青模範」。大李莊鄉後來最出名的知青模範薛喜梅，是毛澤東按語發表十多年後才於1968年到那裏插隊的鄭州市下鄉知青；而會寧縣當時五個典型中唯一的知青王永強籍籍無名，整個會寧縣後來也沒有出過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知青模範」。即便在《人民日報》轉載了那篇文章、毛澤東還為此發表了「最高指示」並把運動的口徑從城鎮居民移向知青之後，1969年1月初甘肅省「知識青年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安家落戶現場會議」在會寧縣召開，會上印發了「下鄉居民、下鄉知識青年、下鄉社會青年、下鄉幹部家屬以及『歡迎他們去』的社隊和貧下中農代表典型材料」^③，但知青的材料僅佔五分之一，仍然處在一個相對不重要的位置。

當然，這不是說上述那些主角後來沒有成為先進、模範，但他們都是以別的身份，而不是以知青身份聞名。會寧縣的王秀蘭後來當過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見過毛澤東，卻沒有成為「先進知青」——誰都知道這個稱呼對她而言並不匹配；而大李莊鄉當年回鄉的三十二人中，後來出了好幾位基層幹部，如黃發娃、邱振甲等還當過勞模和人大代表，但他們也是作為農村基層

幹部，作為「老支書」、「老村長」而不是作為「先進知青」獲得這些肯定的。作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知青的頭面人物，是後來到此插隊的那些城裏學生，而不是他們。

四 「會寧經驗」適合用於意識形態宣傳嗎？

雖然1955年的大李莊鄉案例並不涉及「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作為意識形態宣傳還是可用的。畢竟這些青年農民讀書後回家鄉，在合作化運動中「大有作為」，符合當時的主流價值觀，還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正面案例。但是1968年的會寧縣案例就不同了，不僅強制縮減城鎮人口與「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沒甚麼關係（當時會寧縣也沒有如此聯繫），而且把王秀蘭這個年屆退休、身有殘疾的鰥寡老人和十四歲的女孩羅蘭芳這類人都趕出城鎮，對社會主義而言是值得大力宣傳的嗎？假如他們是「階級敵人」倒還罷了，文革時對「階級敵人」掃地出門、逐出城市很普遍；可是王秀蘭、羅蘭芳都是「人民」、「革命群眾」。

會寧縣的這篇文章首次發表時，《甘肅日報》也加了「編者按」，宣稱²²：

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指引下，堅決到農村安家落戶，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經過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鍛鍊，廣大城鎮居民的無產階級覺悟大大提高了。……過去，鄉裏人往城裏走，想「到城裏吃鬆活飯」（過輕鬆安逸的日子）；現在，城裏人下鄉上山，想的是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是一種新風尚，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又一項新鮮事物。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下鄉上山的革命行動，是值得讚揚的。他們的這一革命行動，應當引起城市各級革委會和廣大城鎮居民的足夠重視。

這個「編者按」全文沒有提及知青和貧下中農，講的都是「城鎮居民」、「城裏人」和「鄉裏人」。這是說「城裏人」比「鄉裏人」落後嗎？領袖剛剛講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²³，這篇文章就公然聲稱不僅「吃閒飯」的「城裏人」是可恥的，甚至「吃鬆活飯」的城裏工人似乎也是幹活避重就輕的懶漢，以至於農民想進城打工也被說成是「想『到城裏吃鬆活飯』」。

後來據作者回憶，王秀蘭的豪言壯語原來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當死狗」（「死狗」比喻游手好閒、好吃懶做的人）²⁴，還有一種說法把這話歸之於會寧縣另一個下鄉典型、普通工人王慶一²⁵。無論歸之於誰，這話也太不雅，所以該報記者才把「當死狗」改為「吃閒飯」。但是這話其實還不是關乎雅俗問題，它本身就「政治不正確」。社會主義國家居然沒有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已屆退休年齡的殘疾鰥寡老人竟然不能「吃閒飯」，否則就是「當死狗」？「減輕國家負擔」要落到一個已故老工人的殘疾遺孀的頭上？老太太本來就是經歷過「舊社會」的貧寒人家，她也需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老太太的兒

子在城裏工作，兒媳卻被動員下鄉，這樣置家庭人倫於何地？她還帶着年幼的孫輩下鄉，這其實也很「正常」：當時十六歲以下的「知青」成千上萬（會寧縣另一個典型、十四歲的下鄉女孩羅蘭芳就是一例），整戶下鄉的居民家中未成年孩子更多，這些人也不能「吃閒飯」？這不是鼓吹童工（或「童農」）制度嗎？資本主義下童工況且要「自願」，不能是「奴工」，而會寧縣「城裏人」的未成年孩子不下鄉去幹重活，在城裏「吃閒飯」乃至「吃鬆活飯」就要被批評為「當死狗」？這樣的做法是基於「理想主義」嗎？

我們知道，表面上似乎類似的事，自己做和要求別人做、主動做和被迫做，含義就會有極大的不同。在會寧縣案例上，把「吃閒飯」或「吃鬆活飯」的城裏人批評為「當死狗」，這樣表態有人回憶說是迫於政治壓力的「違心」之舉，但當時報導說是自願的。如果是後者，王秀蘭自己不願「在城裏吃閒飯」而主動要求下鄉，我們可以設想她是個「理想主義者」。但是如果政府要求她去，並把「當死狗」的說法用政府的機關報大加宣傳以給其他人施加壓力，對政府來說這動機是「理想主義」的嗎？要求一個已屆退休年齡而且有殘疾的文盲老太太下鄉勞動，這究竟與「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意識形態有甚麼關係？進一步追問：這樣的做法如果制度化，難道符合社會主義的規則？且不說馬克思主義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應當與工業化、工人階級和「先進生產力」，而不是和農村、農民相聯繫，就算毛澤東概念中的社會主義帶有農民色彩或者民粹色彩，平等、福利或社會保障這類烏托邦倫理總該有的吧？

應該說，這種對老弱婦孺社會保障極度缺乏的狀態的確是事實，而且直到改革時期仍延續了很久。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前有論者指出：「歷史上，還有15歲以下60歲以上『不課』之說，現在一些農村稅徵到100歲。某地曾經『正面報導』過一個102歲農婦徐老太在『負擔減輕』後『高興地將今年（2002年）176元的農業稅費交到村支書手中』。而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報導說這位百歲老人交納的稅費並不是村幹部亂收費，而是『合同卡上規定的』。這意味着『法律』要求她繼續承擔繳稅義務。這種義務是『公民義務』嗎？恐怕傳統時代正常的臣民義務也不至於此吧。」^⑥但是要把這種社會保障極度缺乏的狀態與意識形態和「理想主義」聯繫起來卻很困難，一般情況下人們直接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以城裏安置困難、減輕負擔難免等原因來說明上山下鄉的必要性。顯然，會寧縣的做法與上述種種一樣，他們（以及《甘肅日報》）最初也沒有藉此宣傳「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而只是宣傳「減輕國家負擔」。

根據當事人回憶，毛澤東讀到此文後下令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派人趕赴甘肅，增補關於「知識青年」的材料。但是後來《人民日報》轉載的修訂版表明成果有限：《人民日報》版除了把《甘肅日報》版「編者按」中「部分城鎮居民」的提法改成「城鎮的一些長期脫離勞動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識青年」，並加入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外，在正文中其實並沒有增加「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材料。唯一的增補只是把《甘肅日報》版中的「居民王慶一」改成了「知識青年王慶一」。同時，《人民日報》版又刪掉了《甘肅日報》版中明顯不合時宜的兩段話：其一是「城裏人吃鬆活飯」可鄙之說——這種話顯然有誹謗工人階級之嫌；其二是整段刪除了十四歲女孩羅蘭芳下鄉的「先進事迹」^⑦。總之，經過

《人民日報》修改的會寧文章，仍然不像是一篇以知青為主題的文字。可是，毛澤東恰恰就從推崇「會寧經驗」中提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命題。

五 毛澤東為甚麼沒有把紅衛兵主動上山下鄉作為典型？

如上文提到有研究者說，「上山下鄉工作開展以來，毛澤東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⑳。但是事實好像並不如此。其實，在1968年歲末之前，一些有影響的城市紅衛兵聞人就曾經多次發起自願的上山下鄉行動。很多「典型」就發生在毛澤東眼皮下的北京，報章也曾廣泛報導，例如：早在1966年底，北京市的一些紅衛兵發起組織了紅衛兵農墾戰鬥團，要求到海南島去務農^㉑。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學生、造反派紅衛兵首領曲折於1967年10月帶領一批中學生前往內蒙古牧區插隊，當時「聲勢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北京日報》都及時進行了專題報道」^㉒，影響絕不亞於《甘肅日報》對會寧縣的報導。同年11月，又有1,200名中學畢業生在北京市革委會委員、中學紅代會常委、高中學生何方方帶領下到內蒙古草原和東北「北大荒」等邊疆地區安家落戶^㉓。1968年2月，首都中學紅代會又湧現了聞名一時的「赴滇55人」，為首的是著名紅衛兵骨幹李鎮江。他們要求去西雙版納種橡膠，宣稱：「雲南邊疆非常有開發前途，尤其是四大工業原料之一橡膠生產更需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去開發。」他們一路進行宣傳，兩個星期後才到達雲南的農場。各地報紙紛紛報導，周恩來、李富春等中央首長和北京市革委會負責人丁國鈺等對他們的行動都做了肯定的批示^㉔。同年3月，北京長辛店中學畢業生、老勞模之女蔡立堅獨自跑到她「大串聯」時曾經到過的山西赤貧山村杜家山插隊落戶，不久又有四名同學在她感召下前來。《人民日報》以〈杜家山上的新社員——記北京知識青年蔡立堅到農村落戶〉為題做了影響很大的報導……^㉕以上事例都發生在北京，其實，其他省份這類事也有不少。

總之，在「會寧經驗」之前，已經有不少城裏學生熱血沸騰地要求上山下鄉。他們有的是在「革命大串聯」步行長征經過農村時，震驚於那裏的貧困而激發出一種與農民共同奮鬥的使命感，有的是困惑於城裏無休止的派性鬥爭而想到農村另闢「革命」的蹊徑，有的是直接接受了「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意識形態召喚，有的則是基於更為抽象的愛國（屯墾戍邊）或革命熱情。他們上山下鄉的目的地北至內蒙古，南至海南島，後來大規模上山下鄉的兩種基本類型，即去農場（兵團）和到農村公社插隊落戶，這些先行者也都已實踐。但是當時這些人一般不會有就業困境意識，更不會有急流勇退之明。

換言之，這些人發起上山下鄉正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高調，出於爭當「革命新人」的主動熱情——他們並無接受「再教育」的自貶色彩，而是自詡「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世界青年的先鋒」、「毛主席身邊的青年」^㉖，他們要到農村去傳播毛澤東思想，與農民一起「大有作為」，乃至帶動農民幹革

命——就像毛澤東等當年激進的「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方式那樣。但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對此一直沉默，並未為他們講甚麼話。

而會寧縣的做法卻顯然和「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本來毫無關係，那是一篇鼓吹為「減輕國家負擔」而強制性減少城鎮居民（包括老弱婦孺、鰥寡孤獨、殘疾人士，卻並未特別強調學生）的文章。文章雖然也說他們下鄉是自願的，但憑當時的常識誰都知道，一般街道居民、「閒散人員」、老大娘、女孩的「革命自覺」和主動熱情怎麼可能比得上曲折、李鎮江這些紅衛兵？文章本身字裏行間也不迴避運動的強制動員色彩，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也沒有因自願之說產生誤讀。他借「會寧經驗」發布的「最高指示」就明言：「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送子女下鄉，「來一個動員」。但蔡立堅、曲折、李鎮江、何方方等人則是完全不用「說服動員」的主動者，毛澤東為甚麼一而再再而三地視而不見，沒有把他們作為「引路的典型」？

六 「意識形態」與「解決就業」之外的第三種動機

表面上看，「會寧經驗」為「減輕國家負擔」而強制性減少被認為是「吃閒飯」的城鎮居民的安排很受毛澤東欣賞，而他對深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紅衛兵主動上山下鄉卻毫無反應，這與那種認為大規模知青下鄉並非出於烏托邦思想、而是要擺脫就業困境的實用主義解釋是吻合的。但是，毛澤東想的當然不止於此。事實上，在解釋領袖發動這場運動真實動機的「解決就業」說和「意識形態烏托邦」說之外，至少就1968年末這場空前的高強度下鄉「動員」而言，他的主要動機可能是第三種。

毛澤東把「不在城裏吃閒飯」加一字改成「不在城市裏吃閒飯」，原來琅琅上口的「七言詩句」變成拗口的七八字文句。「城裏」變成「城市裏」，明顯體現毛澤東的用意主要在於大城市，而不是在會寧這樣的小縣城。他給會寧縣下放城鎮居民的文章作按語，卻把話題牽扯到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學生，究竟為甚麼？筆者認為，要探討這個問題，必須聯繫1968年下半年毛澤東對城市市民、尤其是學生態度的急劇變化。

1968年入夏以來，關於文革的「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已經發生根本轉變。早在4月10日，毛澤東首次給整個文革下了一個全新的定義：這場革命「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⑤。此後，關於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說法便迅速流行開來。幾乎同時，毛澤東又一改此前他關於兩派都要消除派性的說法，提出「對派性要進行階級分析」^⑥。不久他又借助《人民日報》「五一社論」更明確地說：「派別是階級的一翼。」^⑦於是派性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之說再度泛濫。無怪乎有論者指出：「將『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既給『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個新內容，在全國範圍內清理階級隊伍；又對武鬥起到了烈火烹油般的加劇作用。這項指示的實質與後果都是『挑動群眾鬥群眾』。比如清華兩派，原來互叫『老團』和『老四』，自從有了這項最高指示後就叫『團匪』與『四匪』了。」^⑧

更有甚者，到了6月21日，毛澤東又講了一段文革就是要整「國民黨」的「最高最新指示」，而且講得更具體：「過去我們留下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這是我們的政策。我們沒有教授、教師，沒有辦報的，沒有藝術家，也沒有會講外國話的，只好收羅國民黨的一些人或者比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國民黨有計劃的隱藏在我們的工廠、政府機關和軍隊裏」，「當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師、技術人員一個也不好，不是這樣，但有一部分很不好。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加以清理，好的繼續留下來做工作，壞的踢開」³⁹。毛澤東過去也曾支持過「二月鎮反」，支持過抓造反派中的「壞人」和群眾運動中「跳出來」的「牛鬼蛇神」，支持過鎮壓「經濟主義」（指底層勞工要求改善待遇的「造反」），當然更不用說支持過整知識份子。但是在整體上，他一直強調文革主要是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是針對「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的。可是這時，他卻在總體上改口，把文革說成是要整1949年就已經被打倒的「國民黨」。

誰是當時毛澤東心目中的「國民黨」？它只是「走資派」的另一個說法嗎？當然不。他指的是「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⁴⁰，是指「過去我們留下了一些表現比較好的國民黨人，……教授、教師，……辦報的，……藝術家，……會講外國話的」，總而言之，黨內當權派已經整肅了，領袖現在要整的「國民黨」，是指黨外那些從「舊社會」留用下來的「政治賤民」——乃至疑似「賤民」，尤其是有點知識的「賤民」，當然也包括黨內那些有「賤民」嫌疑的人——但不必是官員，「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們」。

這就把文革從一場主要清理當權派的運動變成一場主要清理「賤民」的運動，或者說，從鼓動老百姓整官僚的運動，變成一場恢復官僚秩序、收拾老百姓的運動。而「賤民」或有「賤民」嫌疑者的「造反」則首當其衝，成為被鎮壓的對象。當然，此後直到毛澤東去世仍然有一些「造反起家」者活動於官場（多為「跑龍套」），但這些人已經不是靠整「走資派」存活，而是要在收拾「賤民」中「立新功」。

果然，就在毛澤東把文革定義為「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不久，全國不少地區就在造反派中發掘出「國民黨」，以及諸如「內人黨」之類的群眾性「反動」黨派。其中廣東和廣西堪稱聞風而動，弄出一個幾乎遍及每個地縣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大案——後來在1980年代已經證明這是冤假錯案。但當時據康生說，這個「反共救國團」的「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而兩廣造反派則被宣布為受到「反共救國團」控制，先後遭到嚴厲鎮壓。此前支持過地方上所謂「造反派」的一些野戰軍部隊也遭清洗，這些部隊負責「支左」的政治部被誣為「國民黨政治部」⁴¹。

當時在軍內清洗中甚至提出了「老保不翻天，天下不太平」的口號⁴²。所謂「老保」指文革初期毛澤東號召對「走資派」造反時，各地當權派為了自保而或明或暗支持的正統勢力，他們曾有力地對抗和鎮壓所謂「造反派」，但在1966年底毛澤東支持的造反高潮中一度與「走資派」一起受挫（有的受到鎮壓，有的暫時蟄伏），並被扣上「保皇派」、「保守派」的貶稱。到了1968年夏毛澤東再次翻雲覆雨時，軍內的揣摩聖意者便理解為要讓「老保翻天」。這種揣摩

當然有點「超前」：毛澤東這時還沒有大規模起用「走資派」，在全國範圍內也還談不上讓「老保」翻上「天堂」^{④③}，但造反派確實已經開始陸續被打下「地獄」了——文革的主要矛頭再次指向「賤民」和造反派，這已經非常明顯。

1968年7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發布^{④④}，北京授權廣西動用軍隊鎮壓造反派。被鎮壓的廣西造反派上訪者和難民大量湧入北京，與其他各省失勢造反派同病相憐。束手無策之際，7月中旬，各省造反派借北京高校造反派的地盤開會尋找上訴解厄之路，卻導致中央大怒，斥為「清華、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黑會」。25日，中央首長接見造反派上訪者（包括廣西「四·二二」派人員），追查「黑會」，宣布「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27日，在事先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北京出動三萬工人、解放軍以工宣隊（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七三布告〉的名義突然衝入清華大學，遭「團派」學生抗拒，發生流血衝突。28日凌晨，毛澤東親率幾乎全部中央首長召見北京高校造反派「五大領袖」，對這五人進行嚴厲訓斥，並宣布廣西的辦法也可以適用全國，造反派如不就範即可「剿滅」。隨後工宣隊普遍進駐各校，北京的造反派也宣告覆滅^{④⑤}。

與此同時乃至此後一段時間，全國連續大規模開展了幾次整肅運動，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幾次整肅都是矛頭向下，收拾「賤民」和前造反派人士。現有研究基本都指出：這個時期是整個文革十年死亡人數最多的時期，流的血超過了文革初期的「造反」和「武鬥」。通過上述種種鐵腕手段，毛澤東終於結束了由他一手發動起來的「造反」，建立起「後文革秩序」——尤其是在城市中。

七 「說服動員」城裏家長把子女送到農村「再教育」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明顯看出，這時毛澤東已經對造反派卸磨殺驢。他在這個時期之初早就說過，現在「輪到小將犯錯誤」了^{④⑥}。而到了1968年秋冬之際，一年多以前被他褒獎備至的「革命小將」已經完全成為替罪羊。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他為何對紅衛兵聞人的主動下鄉不屑一顧。這些人均為毛澤東曾經器重的造反派紅衛兵，他們發起的主動上山下鄉倡議也帶有這類特徵。因為在他們之前那批以高幹子弟為主的「老紅衛兵」，當時大多託上層關係低調去部隊當兵，並未參與這些高調的上山下鄉倡議。當然幹部子弟、「老紅衛兵」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格「走後門」參軍，知青運動大潮掀起後被捲入上山下鄉的也不少。但1968年秋前的倡議者不是他們，而是造反派，應當沒有疑義。

然而，這些造反派紅衛兵當時並未發現自己已經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即便是倡議上山下鄉，仍然是一派叱吒風雲的口氣，殊不知毛澤東已經有終結紅衛兵運動的意向。造反派仍在以其名義鼓動上山下鄉，指出「最艱苦的地方，要派毛主席身邊的青年去」，主張知青下鄉就像新的「長征」，是去傳播革命火種的「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④⑦}。這些說法顯然已經過時，新形勢下他們只能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

這裏有必要注意「再教育」這個概念的由來與演變。事實上，「再教育」的說法起源於1963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但當時說的是要對共產黨的幹部進行「再教育」。如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給中央的社教運動報告就提出：「這次運動，是給我們幹部一次深刻的階級路線的再教育。」同年3月河南偃師縣委也報告稱要把社教運動中的審幹視作「一個再教育再提高的過程」。4月16日湖南省委又提出「通過修訂生產規劃，向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總路線教育和階級鬥爭的再教育」^{④8}。到了5月，這些「再教育」文字都被收入〈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中，毛澤東並親自發話：「對黨員、幹部要進行教育，再教育。這是一個重要任務。」^{④9}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再教育」的論述都沒有提到學生。實際上，「再教育」明顯有貶斥之意，所謂對幹部進行「再教育」，是與社教運動中已經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互為表裏的提法^{⑤0}。而整「走資派」要起用造反派，所以那時毛澤東是絕不會提出對造反派學生進行「再教育」的。

相反，在1966年紅衛兵運動和該年秋冬造反派興起至高潮期間，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把「革命小將」捧得很高，不僅強調要尊重他們的「革命首創精神」，還特別把一些地方的當權派在運動初期組織工農進校園與造反派學生「辯論」的做法斥為「鎮壓革命造反」、「挑動群眾鬥群眾」，尤其對當權派和「老保」讓農民進城「教訓」學生之舉進行嚴厲制止，稱為「走資派」搞「農村包圍城市」、組織「農民進城搞武鬥」的反革命陰謀，一再強調要讓學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不准外界打壓^{⑤1}。這類表態帶來的強烈影響，是前述1968年7月27日大批工宣隊未經通知突入清華園招致造反派學生抗拒、導致流血事件的原因之一。

但其實這時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早已悄悄發生變化。從1968年春起，毛澤東在一系列「教育革命」調查中重彈工農兵要改造知識份子的老調，並首次用「再教育」一詞來形容這種「改造」。

在轉載「會寧經驗」前半個月，《人民日報》更發表遼寧省新金縣革命委員會的文章〈下鄉知識青年必須由貧下中農給以再教育〉。文章批評知青下鄉後在大隊集中建立「青年點」的做法，聲稱這種做法使知青「出門一大群，不問階級事」，與貧下中農「扯不上筋，掛不上骨」，妨礙貧下中農對他們行使「再教育」大權^{⑤2}。於是分散安置知青成為一時風氣，據劉小萌指出，許多地方甚至把知青一個一個地分散到農戶家中「插戶」^{⑤3}。「會寧經驗」發表八個月後，應該是在毛澤東及中共最高層的授意下，《人民日報》已經在批判學生自己主動下鄉集體建隊的做法，說這是文革前的「黑典型」，使知青「脫離貧下中農，脫離階級鬥爭，只講生產出工」^{⑤4}。

而「會寧經驗」恰恰是個強制動員的經驗，因此深得聖心。毛澤東發出的「12.22指示」就明言：他要發動的不是一場志願者運動，而是「要說服城裏……人」，「來一個動員」。這裏的「知青」不僅不被當成主動者（儘管現實中有些知青極力表現主動），甚至連充當「說服動員」的對象資格都沒有：領袖要說服動員的是他們的家長，讓他們「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一年多前還是「奉旨造反」的「革命先鋒」，如今連自主資格都沒了。

初中生可能還有未成年者，而「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顯然都已經是有自主權利的成年人，豈能「說服動員」了家長就可以被「送」來「送」去？

顯然，正是這種強制動員模式與會寧縣的做法吻合。當然，說是吻合，並不是毛澤東就沒有自己的引導。毛澤東不喜歡紅衛兵到農村去當「革命先鋒」——像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樣，但他確實最希望趕走的主要就是他們，而不是王秀蘭、羅蘭芳這樣的人。儘管本來會寧縣的強制動員對象是小縣城裏包括殘疾文盲老太太在內的「閒散人員」，並非特別針對學生，但毛澤東看中這種動員方式，卻主要意在大城市的學生。這就是他把「城裏」改成「城市裏」的由來，也是本與畢業生下鄉沒甚麼關係的「會寧經驗」被他突兀地用作號召前者的由來。而這些學生不是別人，正是1966至1968年被毛澤東「發動」起來、在城裏鬧得天翻地覆的紅衛兵。如今城裏百業凋敝，升學就業無門，習慣於「造反」的「小將」在為毛澤東火中取栗後已經不再有利用價值，如果不把他們加以整頓，「後文革秩序」如何建立？

在發現「會寧經驗」前，工宣隊（農村是貧宣隊）進駐學校已經把學生整肅一番。現在用「會寧經驗」要求他們去接受「再教育」，在「廣闊天地」裏各奔東西，也就實際上取締了紅衛兵組織。過些日子再找個「五一六」份子之類的藉口，把那些失去組織依託的造反派頭頭抓捕就很方便。把這一宏觀過程聯繫起來看，就無怪乎貴州、湖南等地在宣傳毛澤東指示時提出的口號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⁶⁶，如果去掉「無產階級」這個意識形態裝飾語，可真算是心領神會了。

八 從「安置」到「再教育」

其實在「12.22指示」之前，由於六六、六七、六八連續三屆畢業學生因時逢文革都沒有分配，而多數省份的六六屆小學畢業生卻在該年「按時」升入已經停課的初中，導致全國多數完全中學在1966年秋至1968年秋的兩年間破天荒地滯留着七個年級的大量學生（初級中學則滯留四個年級學生）。這麼多的學生在被領袖「發動」起來鬧騰兩年多後「革命熱情」消退，又不能回歸正常學習，已經造成嚴重的問題。

以筆者所在的廣西南寧市第四中學為例，1968年發生「血腥之夏」，軍隊支持「老保」大規模屠殺被誣為國民黨「反共救國團」控制的造反派和「賤民」。據不完全統計，這場槍林彈雨的內戰（官方時稱「剿匪」）造成8.4萬人死亡，一直持續到8月上旬⁶⁷。事後失敗的「四·二二」派固然覆沒，遭到另一派的殘酷批鬥乃至私刑摧殘，獲勝掌權的一派學生則私藏大量槍支，導致校園屢發「謀殺案」⁶⁸。9月20日，「三七和二司、小8兵團〔1968年內戰獲勝一派學生組織〕為搶奪一間宿舍而動武，一直打到民生路上」，以至於9月末連續兩次在學校及全市「大搜槍」，「聯指〔1968年內戰獲勝一派群眾組織〕開大會上繳槍支也過了很久了，這裏竟還窩藏武器，甚至還有機關槍」。從8月間巷戰結束直到10月末，學校內的活動就是一派清算另一派的批鬥會、清理市區戰爭

廢墟等「義務勞動」，學生紛紛抱怨進校後就「沒摸過書」，不少同學提出「要上文化課」，但學校忙於政治清算，教師不是被批鬥就是在審查中，少數得勢教師則熱衷整治同事、與掌權派學生組織和軍訓團^⑥勾兌爭權，沒人教課。直到10月14日，軍訓團才同意，決定找幾個高中同學給「新生」^⑦上語文（毛著和毛詩詞）、代數、英文，計劃「上午『天天讀』，鬥批改，下午上些文化課」。大量學生在社會上晃蕩，15日，學校奉廣西區革委會令要求各班上報「從沒來過校」的名單，「86班竟有6人之多」。28日，四中奉命到市文化宮禮堂聽廣西工人國慶赴京團見毛主席報告會，結果來人寥寥無幾，來了的許多也早退，「會場混亂，校革委會認為此事嚴重」，下令花三天「集中力量搞，查這件事」，校方培訓學生班幹部的學習班也暫停，「回到班裏查處此事」，兩天後又重聽此報告，每人要寫「表忠書」……

如此混亂之下，無論領袖關於培養「革命新人」有多少意識形態考慮，也無論他關於遣散紅衛兵、恢復正常秩序的現實用心下面是否領會，各地在毛澤東「12.22指示」傳達前，就已經着手進行了上述三屆學生的大規模分配或安置。當時尚無「再教育」之說，「安置就業」的性質相對要務實得多。廣西就是一個例子。

據現有資料，1968年4月周恩來就主持國家計劃委員會與教育部部署加快畢業分配，原則是「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⑧。由於廣西1968年發生「血腥之夏」，因此畢業分配比多數省份晚，但基本特徵與其他各省獲悉「再教育」指示前的情況類似：

一是上山下鄉先從中小城市和城鎮開始，這與前述甘肅的情況是類似的。在大城市尚處於紅衛兵自願下鄉階段時，甘肅會寧和廣西百色這樣的小城鎮先出現針對不只是學生的城鎮居民的大規模強制性下放，這在當時的中國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這一方面是由於1949年後的體制在城鄉之間優先保障城市，城市之間保障大城市，大城市之間保障京、滬這種特殊城市的政策，在經濟凋敝時，缺乏國家政策保障的小城鎮人口過剩壓力比大城市更為沉重；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小城鎮學生通常不像大城市紅衛兵那樣高度政治膨脹。儘管為「減輕國家負擔」而強制動員下鄉並沒有紅衛兵聞人主動下鄉那樣富於意識形態浪漫，卻也是計劃經濟下常見的勞動力調配，並沒有太多後來林彪兒子林立果在〈「571工程」紀要〉講的「變相勞改」之意。

二是以相對務實的就近安置為主。筆者後來插隊的百色地區田林縣在1968年11至12月初來了第一批百色知青，與甘肅的會寧縣一樣，他們是與城鎮居民一道下放的。這時還沒有地區以外的知青來到這滇黔桂交界的僻遠窮鄉。不久，南寧第一波大批知青下鄉在陽曆除夕發動，雖然出發是在「12.22指示」公布九天後，但分配方案是早在此前就定下的。根據這一方案，他們全部就近被安排在南寧專區各縣。柳州、桂林等城市的知青也在本地區安置。而且這一輪安置的知青相對集中，知青小組規模一般較大，如後來成為自治區知青標兵集體的田林縣央務小組，在一個八戶人的小山村一次就安置了十五個知青。當時所說的「四個面向」並非僅有農村，儘管由於經濟處於谷

底，多數省份實際只有下鄉一途（個別如山西省在「12.22指示」前有較大比例「面向工礦」），但還是解決就業的思路，沒有從「再教育」着眼。當時的負責機構也與文革前一樣，叫「安置辦公室」（安辦），還不叫「知青辦」。

但在毛澤東突出強調把紅衛兵強制下鄉、需要接受農民的「再教育」之後，那貶斥紅衛兵的意味就更濃了。尤其當受強制的是「狗崽子」（指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和被鎮壓的造反派時，「再教育」確實就更像「變相勞改」了。「12.22指示」公布後，自治區知青下鄉馬上轉向「廣西的西伯利亞」滇黔桂邊區——特意要以艱苦環境「改造」他們。1969年3月，一批南寧市第一中學「聯指」戰士中的「狗崽子」就被發配到比田林縣更遠的西林縣，其中就有幾個月前鎮壓造反派的內戰中的「戰鬥英雄」江國樞。後來他回憶道：「1969年3月，學校公布了上廣西西林縣插隊的名單，總共58人。名單公布之日，我望着名單久久說不出話：1,800多同學篩出這58人，絕大部分是出身不好或家中有問題的。只有兩人出身較好。一個是因為戀人被安排上西林跟上來的；另一人我們懷疑是市裏為摻沙子派上來的（這位插友來西林一年多後南寧第一次來僅招一人的招工就點名招回去了）。而這幫人大多數是在文革中武鬥裏出生入死的『功臣』啊！我明白，因為出身不好，我們這幫『走狗』被『烹』到了西林。上山下鄉這一當時十分神聖的工作，被作為政治懲罰的手段」；「我以為在文革中『文攻武衛』出生入死立下犬馬功勞會給自己政治上帶來改善的夢想破滅了」^⑥。而當年被鎮壓一派的同學則對江國樞的回憶感歎道：「當時階級鬥爭的思想太根深蒂固了！派內還分三六九等。」

1969年暑期後畢業分配再掀高潮。這時廣西由於1968年內戰後經濟有所復蘇，當年的分配並非「一片紅」的上山下鄉，而是有大約12%的工廠名額。由於掌權派是多數派，這些名額遠遠不足，所以掌權派中還必須是根正苗紅、表現積極的人才有可能輪上。像江國樞這樣立有「戰功」的，因為出身是「狗崽子」尚且被「懲罰」到邊荒，何況被鎮壓的「四·二二」派。上山下鄉「被作為政治懲罰的手段」，作為遣散紅衛兵、鎮壓造反派、懲罰「狗崽子」的手段，在他們身上是非常明顯的。雖然同是插隊，但「再教育」指示前因就業困難而下鄉的普通知青是一回事，被強制接受「再教育」的「另冊」知青是另一回事，兩者的待遇並不相同。後來經過長期艱苦奮鬥，在知青運動晚期終於脫穎而出成為自治區頭號「知青標兵」的陳念昆，在1969年從集中營獲釋後，曾經想跟隨1968年正常插隊的同學之步伐，到南寧專區扶綏縣（該校1968年分配定點縣）去落戶，結果竟被當成「流竄犯」抓起來慘遭毒打、遊街示眾，再押到滇黔桂邊區^⑦。這樣的上山下鄉，與「12.22指示」前紅衛兵聞人滿懷豪情的主動下鄉倡議，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般而言，「12.22指示」後，南寧知青的下鄉地不僅從南寧專區改為滇黔桂邊區，安置也更為分散。田林縣指示前下鄉的百色知青主要安置在距縣城相對較近的潞城、板桃等地，每個知青點的人數平均近十人，但指示發出後，到田林縣的南寧知青卻大部分被安置到距縣城200里之遙、三縣交界處的平塘，屬於邊遠縣份裏的深山，而且每個知青點平均只有四人。後來成為先

進典型的田林縣央務小組，「12.22 指示」前第一批集中安置了十五名百色知青（最終到村八人）^③，但「12.22 指示」後於 1969 年來到該公社的陳念昆等九個南寧知青，卻被分散為三個小組，安置到不同的村寨（直到李慶霖告狀後，陳念昆等人才被集中到央務小組）。

廣西的情況當然有其特點，但「12.22 指示」後的上山下鄉，其強制、懲罰色彩比此前更濃，則是比較普遍的。

以知青安置分散化而論，據劉小萌的著作，「12.22 指示」後有的省甚至提出取消知青小組，把知青一個一個地分別安置到各村貧下中農中去「插戶」，或到貧下中牧的蒙古包去「插包」，以便於貧下中農（牧）對他們進行監督、改造和「再教育」^④。這就比廣西做得更激進。上海文革研究者王宗仁指出：1968 年 4 至 7 月，上海市革委會及上海紅代會曾經向黑龍江、安徽、江西派遣下鄉上山考察小分隊，打算在各地建立安置上海知青的農場，知青不遷戶口，農場直屬上海管轄，後來此計劃中途忽然停擺^⑤。當年上海的中學紅衛兵領袖夏寧也回憶證實，張春橋在 1968 年 4 至 6 月曾經派他們去黑龍江愛輝一帶聯繫建立上海知青農場，並且已經與黑龍江領導人潘復生商定，農場建在黑龍江，但由上海市管理，上海派幹部，去那裏的上海知青仍保留上海戶口。後來到 8 月張春橋忽然改變主意，決定凡去農村農場的上海知青都必須註銷上海戶口，把戶籍遷到農村。原來的安置計劃也就不了了之^⑥。張春橋的這一改變雖在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指示發表前，但應該是他作為親信，率先探得毛澤東的想法。顯然，「12.22 指示」造成上山下鄉對知青而言更加嚴酷，絕不僅僅是一兩個省份的現象。

當然，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初瀾已經帶有歧視性——那時上山下鄉並不是普遍的，被動員下鄉的除了少數用於宣傳的典型外，多為出身不好或因各種「問題」而失去升學、留城工作資格的人。文革後上山下鄉普遍化，「普遍的不幸」本來應該有助於減少少數不幸者的相對受歧視感，然而「12.22 指示」遣散紅衛兵、懲罰造反派和「賤民」的用意卻造成了新的歧視：指示後的上山下鄉比之前的條件要苛刻許多。

九 結語

潘鳴嘯在其名著《失落的一代》中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1969 年後的一段時間，一方面知青上山下鄉規模空前，但另一方面這期間又從農民中大量招工，數量甚至與下鄉知青相當^⑦。他以此證明毛澤東發動上山下鄉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解決就業，而是為了實現他關於造就「共產主義新人」的烏托邦理想。然而根據本文的分析，筆者認為潘鳴嘯指出的這一事實的確可以表明毛澤東在 1968 年底掀起大潮的主要動機並非解決就業，而且筆者也不反對說毛澤東抱持理想主義，但是從他看重「會寧經驗」中王秀蘭這類典型，卻不理會紅衛兵聞人的主動下鄉來看，意識形態與解決就業恐怕都不能說是當時的第一動機；對紅衛兵卸磨殺驢、兔死狗烹，起碼在那時是他首先考慮的出發

點。至於「縮小三大差別」，那就更是無從談起了。前引「會寧經驗」發生地定西軍分區司令員孫繼力的話證明，真正最嚴重的「城鄉差別」，恰恰是在上山下鄉成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農村被當做不幸者的流放地之後才造成的。

註釋

① Thomas P. Bernstein,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中譯本參見伯恩斯坦著：《上山下鄉：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頁42-52。

② 參見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尤其是下卷，即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③ Michel Bonnin, *Génération perdue. 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1968-1980*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4)，英文版參見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trans. Krystyna Horko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3)。中文版方面，201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版本有刪節，全本參見潘鳴嘯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本文所引觀點見頁37-38。

④ 潘鳴嘯：〈毛澤東改造知青一代的努力完全失敗〉（2012年5月15日），曾刊於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panmingxiao/detail_2012_05/15/14541233_1.shtml；另可參見〈鳳凰網對話潘鳴嘯：毛澤東改造知青完全失敗〉（2012年5月17日），烏有之鄉網刊，www.wywxwk.com/Article/zhuanzai/296156.html。

⑤ 林霞虹、羅樺林：〈麥田裏守望逝去的青春〉，《廣州日報》，2008年12月26日，A18版；〈《在一個鄉裏進行合作化規劃的經驗》一文按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頁527。

⑥⑩ 孟冉：〈中原鄉村演繹「廣闊天地」傳奇〉，《大河報》（鄭州），2008年3月29日，A14版。

⑦⑫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甘肅日報》，1968年12月10日，第1版。不少後來著述記為12月8日，誤。

⑧⑬ 參見趙仕樞：〈上山下鄉狂潮是如何形成的？〉，《黨史縱橫》，2004年第7期，頁36。

⑨ 「12.22指示」又稱「12.21指示」，因為這一指示是12月21日晚廣播發表、22日見報的。參見〈「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人民日報》，1968年12月22日，第1版。

⑩ 土改時雖已有僱農、貧農、中農（又分為下中農、上中農）的劃分，但「革命階級」一般說的是「貧僱農」，「貧下中農」的說法是合作化時才興起的，到1960年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才成為農村「革命階級」的官方稱謂。

⑫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77。

⑬ 統購統銷開始於1953年秋，而該年豐收，市場穀賤，國家統購並不困難。1954年農業減產，統購的強制性才開始顯現。

⑭⑮ 黃建祥、趙平：〈對一句經典口號的考證〉，《人民政協報》，2012年8月9日，B1版。

- ⑮ 參見會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會寧縣志(1990-2005)》(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頁855。
- ⑯ 郭忠慶：〈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曾刊於「檔案界」網，www.360doc.com/content/10/0123/22/470767_14255532.shtml；另可參見郭忠慶：〈「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與城鎮居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2021年6月7日)，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網，www.cheds.pku.edu.cn/yjcg/354984.htm。
- ⑰⑱ 任重：〈會寧紀事(三)：光陰好比打牆的板——我們也有兩隻手〉，曾刊於www.ladpf.cn/detail_16485102.htm。
- ⑲⑳㉑ 宋育紅：〈一位引發上山下鄉運動的軍人〉(2018年6月15日)，搜狐網，www.sohu.com/a/235837802_100015028。
- ㉒ 《會寧縣志》編委會編：《會寧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頁625。
- ㉓ 毛澤東：〈對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968年8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527-31。
- ㉔ 《人民法院報》，2002年7月12日；秦暉：〈擺脫「黃宗義定律」仍待努力〉(2009年3月6日)，搜狐財經網，<https://business.sohu.com/20090306/n262654692.shtml>。
- ㉕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第1版；〈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第1版。
- ㉖⑳㉗㉘㉙㉚㉛ 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頁109；113；114-16；117-19；108-12；194-97；194-97。
- ㉜ 紅晉中：〈杜家山上的新社員——記北京知識青年蔡立堅到農村落戶〉，《人民日報》，1968年7月4日，第4版。
- ㉝ 〈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是最好的戰備〉，《人民日報》，1969年3月16日，第4版；〈紅衛兵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希望 各國人民和輿論熱烈歡呼紅衛兵做得對，幹得好〉，《人民日報》，1967年1月15日，第6版；〈非洲人民說毛澤東是東方的紅太陽 有了毛主席 就有了希望〉，《光明日報》，1966年5月31日，第3版。
- ㉞ 〈芙蓉國裏盡朝暉——熱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1968年4月10日，第1版。
- ㉟ 〈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勝利——熱烈祝賀安徽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1968年4月20日，第1版。
- ㊱ 〈乘勝前進——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人民日報》，1968年5月1日，第1版。
- ㊲ 胡鵬池、但樂：〈「清華7.27事件」大背景及相關大事件〉，《記憶》，第164期(2016年8月15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5/164期記憶北京高校二-.pdf>，頁20。
- ㊳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517-18；1515。
- ㊴ 參見侯工：〈文革之殤〉(2013年7月10日)，愛思想網，<http://m.aisixiang.com/data/65579.html>；劉凌：《我的檢查與交代》(1973年4月18日)，筆者收藏之複印件。劉凌時為解放軍野戰軍四十七軍新任政委，奉派前來清洗該軍的「國民黨政治部」。
- ㊵ 劉凌：《我的檢查與交代》。
- ㊶ 當時各地所謂的「老保」處境不一，有的如廣西，其實在造反高潮時就未被衝垮，後來受到軍隊支持一直處於優勢，並無「翻天」問題，只有鎮壓對手更加有恃無恐的趨勢。有的如上海，1966年「老保」本來就不成氣候，而所謂的「造反派」中「奉旨造反，遵旨掌權」的主流派很快扮演了「宋江打方臘」的角色，對1966年有自身訴求的「造反派」(所謂的「經濟主義者」)和1967年後繼續造反者都進行了嚴厲鎮壓。更多的地方則是原有「老保」失勢後，在軍隊「支左」下興起了新的「保守」勢力。

- ④⑨ 後來在1980年代「處遺」(調查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中,〈七三布告〉被改革時期的當局宣布撤銷,八萬餘人因此獲得「平反昭雪」。參見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第七冊(南寧:內部出版,1987),頁129。
- ④⑩ 詳見秦暉:〈血腥之夏:1968年廣西與北京造反派的覆滅〉,《思想》,第32期(2016年12月),頁93-160。
- ④⑪ 毛澤東1968年7月28日召見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時的訓話,參見〈聶元梓等整理的《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1968年7月30日),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www.marxists.org/chinese/linbiao/mia-chinese-linbiao-19680730.htm。此訓話有多個版本,但各版本均有這句話。
- ④⑫ 中共湖南省委:〈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報告〉(1963年2月8日); 偃師縣委:〈河南省偃師縣三級幹部會議的作法〉(1963年3月23日、27日); 中共湖南省委:〈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第二次報告〉(1963年4月16日),均見於〈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即〈前十條〉的一系列「附件」。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3)。
- ④⑬ 毛澤東:〈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的指示〉(1963年5月),載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編:《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五卷(內部資料,1968),頁46。
- ④⑭ 參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965年1月14日),雲阿雲網, www.hmszqq.com/m/ArticleShow4.asp?ArticleID=4847&BigClassID=106&SmallClassID=
- ④⑮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④⑯ 〈下鄉知識青年必須由貧下中農給以再教育〉,《人民日報》,1968年12月6日,第6版。
- ④⑰ 〈用毛澤東思想培育革命事業接班人——湖南沅江縣各級革委會和貧下中農對知識青年進行再教育的經驗〉,《人民日報》,1969年8月24日,第4版。
- ④⑱ 例如〈關於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報告〉,載貴州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貴州省志·勞動志》(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頁411提到:「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很重要的意義。」
- ④⑲ 本節引文如無特別註明,均引自《黃志先日記》(未刊),感謝黃志先同學提供。
- ④⑳ 1967年春解放軍廣西軍區根據毛澤東「三七指示」派駐該校的現役軍人,以對師生進行「軍訓」為名,實際執掌學校大權。
- ㉑ 1966年暑期後進校的初一學生,因文革爆發一直沒有上過課,此後兩年學校更停止招生,因此他們直到1968年11月仍被稱為「新生」,但12月六八屆學生離校後,他們幾乎一夜間便成了「畢業班」學生。
- ㉒ 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頁288。
- ㉓ 江國樞:〈西林插隊紀事〉,電子文稿,江國樞提供。
- ㉔ 1968年「血腥之夏」中陳念昆曾在鎮壓「四·二二」派的所謂「剿匪」行動中被俘,被掌權派私刑關押一年多;文革後已平反。參見筆者對陳念昆訪談,南寧,2018年3月30日。
- ㉕ 四名華僑知青要求轉隊,三名女生到村數月後被大隊黨支書調到他本人所在的另一村。
- ㉖ 王宗仁:〈上海知青跨省插隊中幾個問題的辨析〉,《青年學報》,2017年第2期,頁106-12。
- ㉗ 夏寧:〈1968年上海知識青年下鄉上山原方案是到黑龍江自辦農場不遷戶口的——對一段幾近湮沒歷史的回憶〉(2018年3月4日),未刊稿。
- ㉘ 潘鳴嘯:《失落的一代》,頁37-38。